

# 桶的故事 书的战争

〔英〕乔纳森·斯威夫特 著 管欣 译



涵芬书坊 027



1857  
The Commercial Press  
商务印书馆



涵芬书坊  
027

# 桶的故事 书的战争

〔英〕乔纳森·斯威夫特 著  
管欣 译

 商务印书馆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6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桶的故事·书的战争 / (英)斯威夫特著;管欣译. —  
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6

(涵芬书坊)

ISBN 978-7-100-11477-6

I. ①桶… II. ①斯…②管… III. ①散文集—英国—  
近代②诗集—英国—近代 IV. ①I561.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164327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桶的故事 书的战争

[英]乔纳森·斯威夫特 著

管欣译

---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1477-6

---

2016年10月第1版

开本 889×1194 1/32

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10½

定价: 50.00元

## 中译本序

管欣

### 作者生平

1667年11月30日，乔纳森·斯威夫特（Jonathan Swift）出生于都柏林。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，3岁时母亲又返回了英格兰的娘家。小斯威夫特由伯父戈德文抚养长大。在他6岁那年，戈德文送他去念当时爱尔兰最好的学校——基尔肯尼语法学校，与剧作家康格里夫（William Congreve）同窗。1682年，斯威夫特入三一学院求学，在这里遇到了一些麻烦，最后以“特别开例”（*speciali gratia*）的名义勉强毕业，获文学士学位，继续留校攻读硕士学位。1688年，光荣革命爆发，爱尔兰局势机阻不安，戈德文又撒手人寰，斯威夫特被迫中断学业，去英格兰投奔母亲的远方亲戚坦普尔爵士（Sir William Temple）。

坦普尔是17世纪英国颇具声望的政治家、文学家，晚年退隐距伦敦40英里的宅邸摩尔园（Moor Park），专心从事创作，擅长写作散文。斯威夫特担任坦普尔的秘书，为其整理文稿。坦普尔对古典文化的钟爱对斯威夫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摩尔园丰富的藏书开阔了他的视野，从此斯威夫特学问大进。其间斯威夫特多次来往于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，并于

1694年获爱尔兰教职，担任贝尔法斯特附近一个小教区的牧师。

斯威夫特在摩尔园邂逅年方8岁的司黛拉（Stella）<sup>①</sup>，开始了一段长达四十年的友谊。斯威夫特教她读书认字，按照自己的理想，把她塑造成一位知书达礼的淑女。1699年，坦普尔逝世后，留给司黛拉一份爱尔兰的土地，而斯威夫特也返回爱尔兰发展，任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牧师。1701年，在他的建议与资助下，司黛拉来都柏林定居。

摩尔园十年的读书生涯为斯威夫特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。1701年，斯威夫特初试啼声，发表了《论希腊和罗马的内部纷争》，此文以古典历史为背景，借古讽今，影射当代。1702年，斯威夫特获神学博士学位。1704年，《桶的故事》发表后一炮打响，当年就出了三个版本，斯威夫特名声大震。1707年后，斯威夫特作为爱尔兰教会的代表常驻伦敦，游说执政当局减免税收。在伦敦期间，斯威夫特与辉格党作家阿狄生（Joseph Addison）、斯梯尔（Richard Steele）等交友，为《闲谈者》（*Tatler*）等刊物撰稿。1708年，为了戏弄占星家帕特里奇，斯威夫特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模仿占星家的风格撰文预言帕特里奇的死期，弄得帕特里奇狼狈不堪。

斯威夫特继承了古典传统，一生热爱自由，信奉辉格党的政治哲学，但是辉格党政府不能满足爱尔兰教会的要求，而斯威夫特又希望维护英国国教的统治地位，同时与法国实现和解，这也与辉格党的政策背道而驰。权衡利弊后，斯威夫特最终倒向托利党一边，任托利党刊物《考察者》（*Examiner*）编辑和主笔，撰写了大量反映托利党观点的文章，深受托利党领袖罗伯特·哈利、亨利·圣约翰器重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斯威夫特升任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教长。1713年，他参加了

---

<sup>①</sup> 原名艾斯特·约翰逊，系坦普尔女管家之女。

涂鸦社 ( Scriblerus )，该俱乐部以托利党才子为主体，主要成员有蒲柏 ( Alexander Pope )、盖依 ( John Gay ) 等，他们意气相投，擅写讽刺文章，即使后来天各一方，仍然保持着终生的友谊。

在这段时间，斯威夫特身边又出现了一位年轻女性——艾斯特·范讷梅瑞 ( Esther Vanhomrigh )，斯威夫特把她叫作范妮萨 ( Vanessa )。范妮萨当时才二十出头，对斯威夫特一往情深。斯威夫特似乎很早就立志终生不娶，并写下了《卡德努斯和范妮萨》，称赞范妮萨是维纳斯女神打造的完美女性，而自己作为一名四十多岁的老男人，实在很不般配。范妮萨执意离开母亲，追随斯威夫特来到爱尔兰。斯威夫特同时要两位红颜知己周旋，已经十分尴尬；在都柏林的小天地内，身为教长的斯威夫特动见观瞻，行动更受束缚。他与司黛拉从未单独相处，每次见面时，司黛拉身边都有女友相伴。范妮萨来爱尔兰前，斯威夫特写信劝她三思，直言在都柏林他们来往的次数不会很多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一见杨过误终身，1723年范妮萨去世，年仅34岁。

伦敦的政治生涯是斯威夫特人生中一段闪亮的日子。他既是执政党的文胆、高层的幕僚，又与当世一流的文人为友，可以说同时进入了政坛和文坛的核心层。他在给司黛拉的书信中，记述了自己在伦敦的见闻与感想，后集成《致司黛拉书》一书。斯威夫特认为，如果不是由于《桶的故事》触怒了安妮女王，他还可以升到主教的职位。政治风云变幻莫测。1714年，安妮女王驾崩，乔治一世继位，开创了英国史上的汉诺威王朝。托利党随之下台，哈利、圣约翰受到清算，斯威夫特返回爱尔兰自我放逐，从此断绝仕进之路。

斯威夫特偃旗息鼓了五六年时间，在此期间没有发表多少作品。他在暗中积蓄力量，重新界定自己的位置。从1720年开始，斯威夫特以笔为剑，为爱尔兰人发言。1722年，英国五金商人威廉·伍德走乔治一世

情妇的路子，获得在爱尔兰铸造半便士和四分之一便士的权力。爱尔兰人担心伍德铸造的铜币大大超过实际所需，引发货币贬值，一时舆情汹涌。斯威夫特以布商的名义写了七篇文章（即《布商的信》），对此进行猛烈抨击。当局悬赏三百英镑捉拿作者，尽管作者身份是公开的秘密，举国上下几乎无人不知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出面领赏。英国政府被迫收回成命，斯威夫特成为爱尔兰的民族英雄。1726年，他去伦敦递交《格列佛游记》手稿，回来时受到盛大欢迎，有人打出了“欢迎回家，布商”的旗帜，一时间钟鼓齐鸣，街道上燃起篝火，人们一路高喊“布商万岁”，簇拥着他回家。

1721年，斯威夫特着手写作《格列佛游记》，中间因为《布商的信》而有所中断，现在终于大功告成。在伦敦时，他住在蒲柏的别墅内，和阔别十余年的老友共同编辑文稿，谋划出版事宜。1726年10月，《格列佛游记》问世，立即引起轰动。1729年，斯威夫特发表了《一个小小的建议》，这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，也是他散文创作的代表作。就像文学史上一再发生的事情那样，1714年的仕途失意成为了他推陈出新、再度出发的契机，他在五六年内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系列作品，个人声望达到了巅峰，永久地确立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在伦敦期间，斯威夫特收到司黛拉病重的消息，于是匆匆赶回。传说斯威夫特与司黛拉在1716年秘密结婚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我们会感到十分安慰。可惜仅仅是传言而已，没有真凭实据。1728年司黛拉去世，终年46岁。

斯威夫特年轻时得了梅尼埃病（美尼尔氏综合征），此后终生为其所苦。1738年后，斯威夫特的健康持续恶化，直至精神失常。1745年10月19日，他在饱受病痛折磨后，终于离开人世，遗体安葬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，与司黛拉为邻，遗产悉数捐出，用于建设爱尔兰的第一家精神

病医院，该医院直到今天还在运营。他生前用拉丁文自撰碑文：“这里安葬的是神学博士乔纳森·斯威夫特教长，义愤从此不再折磨他的心肠。旅行者啊，如果你能，请效仿这位不屈的自由斗士。”

## 古今之争

1687年1月27日，佩罗（Charles Perrault）在法兰西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当众诵读了《路易大帝世纪》（*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*）一诗，歌颂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取得的长足进步，并把莫里哀、马莱伯（François de Malherbe）置于古典作家之上。佩罗的观点遭到了布瓦洛（Nicolas Boileau Despreaux）等人的激烈反对<sup>①</sup>，双方就古代人和现代人孰高孰低、人类在进化还是退步展开争论，这就是17世纪末法国文坛著名的“古今之争”（*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*）。

布瓦洛、拉辛、拉封丹、拉布吕耶尔（Jean de La Bruyère）等人站在古人一边，主张人类是在不断堕落的，古人在政治哲学、文学上的成就为现代人所不可企及，古希腊、古罗马的文学是后世从事文学创作的唯一典范。

以夏尔·佩罗、丰特奈尔（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）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厚今薄古，认为古人不及今人，伽利略、牛顿物理学超过了古代科学，科学的方法完全可以运用于政治学、伦理学。丰特奈尔提出，古今分享同一个自然，古代人和现代人在才智上是平等的，现代人完全可以取得荷马、柏拉图那样的成就；古代人之所以有那么多发现，是因为他们出生在我们前头；千百年后，后人也将对我们顶礼膜拜，一如我

---

<sup>①</sup> 有人说，布瓦洛之所以要反击是因为佩罗在诗中没有提到布瓦洛的名字。



们如今崇敬古人的模样。

1690年，坦普尔发表《论古今学术》( *An Essay upo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* )一文，将这场争论引入英国。坦普尔认为从希波克拉底到马可·奥勒留是西方文化的黄金时代，此后1500年，西方人停滞不前。虽然在过去的150年间，西欧学术进步神速，天文学出了个哥白尼，医学出了个哈维，但坦普尔怀疑这两家的学说根本是错误的，即便正确也没多大意义。现代人在哲学和文学上都不及古人，根本不懂音乐为何物，虽说在航海上做出了一番成就，可惜还有不少缺陷，如果让希腊人或罗马人来干会干得更好。站在巨人肩头的矮子不一定看得比巨人更远，他可能是近视眼，有恐高症，或者压根儿不喜欢望远。

作为一名古典爱好者，我可以理解坦普尔、斯威夫特的心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一个熟读古典的人又怎能在时髦的新书面前提得起精神呢。但是坦普尔犯了一个技术错误，他在论证古典作品具备永恒价值的时候，以所谓年代最古老的《伊索寓言》、《法拉里斯<sup>①</sup>书信集》为例，并断言后者是真品，绝非后人所能伪造。现在大致可以确定，《书信集》是后人伪托之作，但在坦普尔的时代这一点还有争议。无论如何，坦普尔此举很不审慎，因为他没有读过希腊文版本，对文献校勘也不在行，而且这一段文字篇幅不大，并非文章核心论证，即使删去也无关宏旨，实在不该贻人把柄、予人口实。1694年，沃顿( William Wotton )<sup>②</sup>撰文(《对古今学术的反思》)对古今学术进行比较，提出了相反的观点。1697年，

---

① 法拉里斯( Phalaris )，公元前6世纪的西西里暴君，把人放在铜牛里活活烧死。

② 沃顿( William Wotton，1666-1727年)，英国学者。他是一位天才，6岁就能读拉丁文、希腊文、希伯来文《圣经》，10岁进剑桥大学，13岁就获得了学位。他写《反思》时才28岁。

沃顿对该文做了修订，文末收录了古典学学者本特利（Richard Bentley）<sup>①</sup>的文章，从地理、引文、语言等多方面对《书信集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，又惹怒了《书信集》的编辑波义耳（Charles Boyle）<sup>②</sup>。波义耳撰写文章反驳本特利，本特利则反驳这个反驳。从此，这场古今之争不但涉及古今学术的比较、《法拉里斯书信集》的真伪，还卷入了波义耳和本特利的个人恩怨<sup>③</sup>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欲罢不能。

在这场争论中真正留下的代表性作品，还是斯威夫特的《书的战争》、《桶的故事》和《格列佛游记》第三卷。斯威夫特前后追随坦普尔近十年（这十年基本上也是这场古今之争进行的十年），受其影响很大，坚定地跟坦普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事实上，《书的战争》中的许多人物都出自坦普尔的文章。

《书的战争》说的是，在帕尔纳索斯山的两座山峰上分别居住着古代人和现代人。现代人抱怨对方挡住了自己的视线，要求交换住处，或者干脆把山峰削低一点。古代人断然拒绝，因为他们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居民，此山也给现代人带去了清凉，曾为其遮风挡雨，更何况这还是一块完整的岩石，根本奈何不得。于是，双方打起笔仗，出了很多的书，其中有代表性的都进了图书馆。

---

① 本特利（Richard Bentley，1662-1742年），英国最伟大的古典学学者之一，对法拉里斯的研究是其主要成就之一。伍尔芙说他对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了如指掌，能把荷马史诗倒背如流，读品达就像我们读《泰晤士报》一样。他的脾气很大，曾经在三年内打了六场官司，而且还都打赢了。

② 查尔斯·波义耳（Charles Boyle，1676-1731年），英国贵族，翻译过普鲁塔克，编辑法拉里斯的时候才17岁。除了文艺之外，他对科学也饶有兴趣，英国钟表匠George Graham制作了世界上第一部太阳系仪献给他。

③ 波义耳曾经托人向本特利借法拉里斯的一部抄本，结果书是借出来了，但是波义耳没有及时完成校对，书又被本特利要了回去。

这些书籍还保存着作者好斗的精神，在图书馆里继续争吵。现代书虽然人多势众，但是衣衫褴褛，装备很差。它们吹嘘其实自己更为古老<sup>①</sup>，自力更生，马匹是自己养的，武器是自己造的，衣服也是自己缝的，虽然有少数书在借鉴古书，但是大多数对这种做法是不屑一顾的。

斯威夫特行文至此，笔锋一转。在窗边的一个角落里，蜜蜂撞破了蛛网，和蜘蛛吵了起来。蜘蛛说，这个城堡是自己亲手建造的，用的都是自家的材料，不像蜜蜂那样一无所有，以偷窃为生。蜜蜂则反唇相讥蜘蛛坐井观天，闭目塞听，从外界吸收了一些毒药，自己又制造了一些毒药，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力更生，而它则四处游历，遍访百花，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，把蜂蜜和蜡带回家中。

这个插曲其实是在点明题旨：蜘蛛这个现代人吹嘘自己是自出机杼、不资外力，炫耀自己在建筑和数学上取得的进步，其实迷宫式的蜘蛛网复杂烦琐，作茧自缚，所谓自力更生其实是自我复制，吸收的是糟粕，制造的是争吵。蜜蜂则是古代人的吹鼓手，它采撷自然界精华，给人类提供了两样最高贵的东西：甜蜜和光明（sweetness and light）。

作者模仿史诗的笔法描写了这场古今之战。在现代书的阵营中，有以塔索（Torquato Tasso）、弥尔顿为首的骑兵，笛卡尔、霍布斯率领的弓箭手，以及司各脱（John Duns Scotus）、阿奎那率领的乌合之众。古代书更是猛将如云，阵营整齐，荷马、欧几里得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希罗多德、李维等纷纷出场，甚至还惊动了奥林匹斯山上的天神。战争打响后，荷马、品达等所向披靡，现代书阵脚大乱。在休战间隙，本特利与沃顿溜到敌方阵地，想立点偷鸡摸狗式的功劳。他们盗走了法拉里斯

---

<sup>①</sup> 这是培根的观点。

和伊索的盔甲，回来时不幸碰上坦普尔、波义耳，结果双双丧命。文章至此戛然而止，尽管作者在标题中许诺，他将提供一部完整而真实的历史。

文章开头模仿了霍布斯式的政治哲学风格，整部作品采取的是历史的体裁，模仿了《伊索寓言》、《荷马史诗》的写法。这是一部用崇高的体裁描写卑微对象的作品，全篇充满了奇思妙想，涌现出一系列天才的创意，前半部分尤见匠心。我没有读过沃顿等人的文章，不知道他们究竟犯了多大的过错，要承受如此嘲弄，好像他们受到的折磨永远也没有停止的时候。

## 爱尔兰爱国者

我之所以欣赏斯威夫特，一是文章好，妙语如珠，奇纵奔放；二是读书多，学养丰厚，尚友古人。仅此两条也不足奇。文人学者在所多有，二三流的作家如果从来不读，好像也没多大损失；学者就更不用说了，大多数论文除了编辑之外，再也没有读者了。在斯威夫特的时代，人们更看重的是他作品的政治意义。他的英国著述、爱尔兰著述乃至宗教著述，无一不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。他在当世的社会事务中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在爱尔兰人民的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，其影响至今不衰。

斯威夫特的正式职业是教士，文学只是业余爱好，用来表达政见。斯威夫特一生写了大量文章，除了《格列佛游记》有200英镑的稿费以外，从来没有从写作中获得任何收入，而且他也不屑于这样做。

斯威夫特来自一个信仰国教的大家庭，祖父是一位国教牧师，因为支持詹姆斯一世，被清教徒褫夺教职，没收了大部分家产。国教在爱尔兰处于弱势，爱尔兰人大多信仰天主教；在信仰新教的英格兰移民中，

不信国教的又占多数，国教信徒在爱尔兰是少数派。斯威夫特最初服务的教堂荒凉破败，门庭冷落，下层教士生活十分清苦。无论是家庭的背景，还是个人的经历，都决定了斯威夫特的立场只能是维护爱尔兰教会的利益。

1673年英国议会通过《宣誓法》，爱尔兰教会在法律上被确定为国教，不信国教者不能出任公职。斯威夫特支持这个法案，拒绝对拒不服从的新教徒实行宽容。他主张服从现有的社会制度，将某种教义定于一尊，设立一个法定的教会，以平息教义上的争端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斯威夫特是反对宗教自由的，最起码他主张对言论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。在他看来，《圣经》是人们唯一应该信奉的权威，有些教义上的难题，比如“三位一体”，如果《圣经》上没有明确的解释，我们不必去盘根究底。我们视若至宝、拼命鼓吹的那些个人意见不过是理性的无端骄傲，现存的社会制度纵有百般不是，“彼相争以鸣者，固莫之能取而代之”。国教如果有不好的地方，可以进行改革，但是绝不能搞宗教多元化，因为这是国家动乱之源。没有人具有完全理性，谁也不能掌握全部真理。如果有人宣称，只有按照他的意见治国国家才能繁荣昌盛，那是走火入魔的征兆。人不是理性的动物（*animal rationale*），而是能够使用理性的动物（*rationis capax*）。因为观点不同而进行战争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事情。

斯威夫特是当时具有巨大影响的政论家，一度担任过执政党的笔杆子，介入政治的程度很深。他21岁时经历了光荣革命，见证了英国民主政治的开端。1695年《授权法案》废止后，图书出版不需要申请许可证，书刊检查制度就此作古，英国文坛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，各种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各路文人纷纷粉墨登场。这是一个新闻业的黄金时代，和我们现代少数几家大公司垄断媒体的局面截然不同。当时人人

可以发布新闻，在小册子上月旦时事，在咖啡馆里指点江山。<sup>①</sup>随着咖啡馆里的辩论开始影响政坛走向，报纸和刊物成为政治意见的角斗场，政治家们纷纷跑马圈地，创办杂志，延揽文人，争夺话语权。阿狄生、斯梯尔的《闲谈者》、《旁观者》( *Spectator* ) 代表辉格党的观点，斯威夫特的《考察者》传递了托利党的声音<sup>②</sup>。斯威夫特见证了今天我们所谓“公共领域”的形成。事实上，哈贝马斯在追溯公共领域的历史时，首先就以斯威夫特、斯梯尔等人作为范例。<sup>③</sup>

斯威夫特是安妮王后统治时期托利党的头号宣传家兼新闻发言人，他的《盟军的行为》一文问世后取得极大反响，影响了社会舆论，为缔结《乌得勒支条约》、结束西班牙王室继承战争出了大力。定居爱尔兰后，斯威夫特笔耕不辍，写了很多小册子，就各类政治、经济问题发表看法<sup>④</sup>。在他看来，爱尔兰自然条件优越，人口众多，人民也很勤劳，之所以生活困顿、百业萧条，主要责任在于英国的压榨和爱尔兰自身的愚蠢。

从出生地来说，斯威夫特是爱尔兰人；从血统上说，他又是英格兰人。斯威夫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英格兰教士，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，父亲随大哥移居爱尔兰，而斯威夫特的母亲则是外祖父移居爱尔兰后所生。爱尔兰是斯威夫特的家乡，他在此地出生，又在此地终老，1714年

---

①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今天的互联网时代，在一定程度上又复归到了这个时代。

② 除了斯威夫特以外，罗伯特·哈利还有一个笔杆子——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的作者笛福。

③ 按照我的理解，哈贝马斯所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，仅指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。此后，随着国家和社会的融合，具有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已经瓦解或者说转型了。

④ 《一个小小的建议》中有一个段落，罗列了作者提过的建议，洋洋大观。

后只去过英国两次。他同情爱尔兰人的不幸遭遇，并在下半生完全站在了爱尔兰一方。

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完全是独断而专横的，其推行的政策无非是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，在决策前又不与爱尔兰进行友好协商。少数英国人占有大部分爱尔兰的土地，而且其中多数并不在爱尔兰居住<sup>①</sup>。为了保护本土的产业，英国禁止向爱尔兰进口呢绒，爱尔兰的经济一直是以农业为主，工业始终发展不起来。18世纪20年代，南海泡沫破裂后，爱尔兰的信用体系受到破坏。20年代末连续多年农业歉收，出现严重的饥荒，民不聊生，人们纷纷移民美洲或者去当雇佣军。

爱尔兰有一种奇怪的现象，很多重要的职位由英国人占据。他们从不踏足爱尔兰半步，却照样领那份俸禄。英国实际上把爱尔兰当作自己的皮夹子，用来解决官员的就业和经费问题。比如，乔治一世想给自己的情妇搞一份年金，这时就需要爱尔兰出来买单了。1722年，乔治一世授权英国五金商人威廉·伍德，为爱尔兰铸造360吨<sup>②</sup>半便士和四分之一便士。肯德尔公爵夫人因此收了伍德1万英镑，据说还可以从伍德的利润中获得分成。

爱尔兰此时确实铜币匮乏，原因之一是它不能自行铸币。爱尔兰人多次请求设立像英格兰那样的铸币厂，但是都没有得到批准。在需要的时候，国王会授予某人特许状，铸造一定数量的货币，供爱尔兰使用，数百年来一直如此。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伍德不提供对其铜币的赎回，政府对其铸造货币的数量和质量又没有有效的控制。斯威夫特署名

---

① 即所谓的“不在地主”。

② 合108 000英镑。

M.B. 布商<sup>①</sup>，写了七封信，每一封针对一个不同的对象<sup>②</sup>。第一封信用简洁平易的语言，向普通百姓介绍了事情的原委，分析了利害关系，呼吁国民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，集体抵制伍德的半便士。伍德为了扭转自己在舆论上的不利局面，提出缩小铸币的规模。斯威夫特在信中痛斥此论之不通，爱尔兰国会对于伍德的行为也一致予以谴责，请求国王收回成命。英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，枢密院在组织调查后，出具报告为伍德说好话。于是斯威夫特又写出了第三封信，用较大的篇幅，详尽地驳斥了这一报告。斯威夫特大声质问道：

难道爱尔兰人民不是像英国人一样生来自由的吗？他们是怎样失去自己自由的呢？他们的议会不是像英格兰议会一样合法地代表了人民吗？他们的枢密院不是一样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，甚至权力还要更大吗？难道他们不是同一个国王的臣民吗？他们不是在同一天阳照耀之下吗？他们不是在同一天帝的保护之下吗？难道说我在英国还是自由人，花六小时时间穿越海峡后就变成一名奴隶了吗？

斯威夫特强调，这是伍德与爱尔兰人民之间的争端。他避免与英国政府产生直接冲突，尤其是摆出一副尊王的姿态，不把思路局限在半便士的问题上，而是直指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。他在致全体国民的第四封

---

① M.B. 寓意 Marcus Brutus，即古罗马共和派志士布鲁图。

② 分别是普通民众、出版商、贵族、全体国民等等。严格说来，正式发表的只有五封。另外两封信，一封写给大法官米德尔顿，署了自己的本名，直到 1735 年才发表。另一封写给国会，更多的是谋划未来，就革除国内的各项弊端建言。信笺写成后，消息传来，伍德的特许状已被撤销。



信中，解释了英国宪政的原则：国王有权铸造货币，但是除非是金币或银币，否则无权强迫人民使用。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是同样自由的民族，爱尔兰不是英国的附属国。爱尔兰效忠于国王，但不效忠于英国国会。英国国会制定的法律对于爱尔兰人没有约束力，“未经被统治者同意的统治就是奴役”。斯威夫特实际是把爱尔兰描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和英格兰的唯一联系是效忠于同一个国王。

这封信发表后，爱尔兰执政者坐不住了。斯威夫特的出版商哈丁旋即被捕，政府悬赏捉拿作者。尽管举国上下无人不知作者身份，但是没有人出来告发，陪审团也拒绝对哈丁进行指控。事情闹大后，英国的首相、大臣们未尝不知此事荒唐，但是骑虎难下，事关帝国体面，终究不肯向殖民地民众示弱。爱尔兰人民同仇敌忾，集中火力攻击伍德一人，坚持在宪政的轨道上解决问题。面对着一个不肯改变自己意志的民族，英国政府最后只好做出让步。1725年8月14日，加特利宣布，国王终止对伍德的授权<sup>①</sup>。爱尔兰人民取得了胜利，这在爱尔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，爱尔兰的民族自信心因而得到大大增强。

## 讽刺天才

据说，曾经有陌生人当着司黛拉的面称赞范妮萨是一位奇女子，竟然能给斯威夫特灵感，写出《卡德努斯和范妮萨》这样的好诗。司黛拉笑着回答，这位教长能够就扫帚的话题写出一篇好文章来。

斯威夫特是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散文家（蒲柏也许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）。他的文章简洁平易、不事雕饰、妙语如珠、奇纵奔放，用他自己

---

<sup>①</sup> 伍德也没有吃亏，他获得了3000英镑的年金（为期十二年）作为补偿。